

Study on the Guiding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Network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COVID-19 Prevention

Xie Yan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COVID-19 prevention, the network rumors are volatile and powerful, which is a normal expression of public opinion that affects the public. The spread of network rumors is the result of macro social background, meso group interaction and micro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interaction. Analyzing of its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it is composed of rumors, rumor, new media, rumor effect and rumor obstacles, and generating information flow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its recipient. Therefor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network rumor should be guided from five paths: leading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identification, creating the communication atmosphere,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providing factual experience.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mechanisms

Received: 2020-07-13; Accepted: 2020-07-22; Published: 2020-08-01

防疫期间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对网络舆论的引导机制研究

谢 琰

中南大学法学院，长沙

邮箱: xy.choice@foxmail.com

摘 要: 此次防疫期间，网络谣言聚合多变，能量庞大，是影响大众的常态化舆论表达。网络谣言的传播是宏观社会背景、中观群体互动和微观个体心理交互作用的结果。分析其传播结构，是由谣传者、谣言、新媒体、谣传效果和谣传障碍构成，并根据受传者的需要产生信息流变。因此，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可从主流话语引导、提升鉴别能力、营造传播氛围、整合信息资源、提供事实经验五个路径对网络谣言进行引导。

关键词: 高校思政教育；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收稿日期：2020-07-13；录用日期：2020-07-22；发表日期：2020-08-01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开放的互联环境下,网络是谣言滋生的温床。在此次新冠肺炎防疫期间,网络谣言从针对李文亮医生等“网络名人”的人身诽谤以及歪曲事实,变身为舆论机制扩散下的影响社会大众的社会事物,网络负面舆论已然成为当今时代日趋常态化的畸形舆论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1]谣言的生命在于传播,网络谣言一旦不再传播,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命终止。在此期间,作为高校思政工作者,应该意识到高校网络舆情与高校内的大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以及学生活动等息息相关,而防疫期间,网络上形成与高校有关的话题如“多地高校延迟开学时间”“大学生自愿返校”等,更加受到大学生群体的强烈关注,所以其影响面更大,传播速度更快,如果出现过度解读及网络传播偏差,外加引导不及时,就极易产生负面影响。针对当下这种影响力日益增强的网络舆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引导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而保障舆论引导科学有效的重要前提是把握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进而发挥高校思政工作特色,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引导策略。

1 网络谣言的内涵和特性

网络谣言是在一定情境下,互联网中出现并广为流传的未经权威渠道公开确认的符合传播者心理需要的信息。习近平总书记表示:“社会谣言的蜂起是一个现象,其根子在于社会内部的稳定状态。”[2]网络谣言的产生也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花边现象,而是“在源于正式与非正式话语空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式话语空间弥补信息不足而产生的替代性新闻”[3]。进入大数据时代,各类信息、流量呈爆炸式发展,其中网络谣言在产生及传播过程中,可归纳出以下特性。

1.1 传播迅速、聚合多变

异步传输并举的技术结构使得网络谣言的传播在瞬间得以完成,虚拟技术的实时互动推动了网络谣言的流变。相较于以线下媒体为载体的谣言更新频率,网络谣言的变化单位可称得上是分分秒秒。同时,传播源的匿名性、传播信息

的可复制性,使得网络谣言的传播者很容易遁形。即使相关部门采取措施进行过滤或封堵之后,很多谣言还是能够卷土重来。

1.2 能量庞大、混淆视听

借助网络的全民覆盖,网络谣言集大众传播、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于一体,实现了人际口头传播与媒体传播、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交叉整合的漩涡复式传播效果;在实时在线技术带来的内容添加和交互技术形成的情绪体验的影响下,网络谣言的能量在一次次大合唱式的重复中形成滚雪球般的能量集聚效果。同时,为迎合网民的求新求奇心理以求在异常激烈的信息争夺战中分得一杯羹,很多传播者放弃行业准则,对信息进行扭曲和夸大,促成信息的失真和网络谣言的兴盛。有专家指出,“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任何人都容易逃避道德的约束和法律的责任,凭借虚拟的身份畅通无阻,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观点,甚至以此来影响其他网民”[4]。而通过分析这种“造谣”心理,主要可归纳出以下两方面的成因。

1.3 情绪宣泄、放大不满

网络是网民释放压力、宣泄情绪的公共平台。现实生活中被地位、身份所压抑的人们,在网络广场上可以自由亲切地交流和对话。这种自由自在的交谈,给传播者带来了一种狂欢式的体验和感受。如同狂欢节让普通生活法令暂时取消了一样,在匿名网络围观时,决定人们各种关系的等级关系被淡化、甚至消解了,日常生活中的不满和压抑被召唤了,潜藏在身体里的能量释放出来了,网络围观者利用网络狂欢突破了生活的种种的限制。此外,网民的不满情绪还会互相传染,甚至激发暴力语言行为,由此形成一场全民的狂欢宣泄。

1.4 随意恶搞、全民娱乐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在摆脱了衣食之忧后,“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5]。在网络社会中,一切表达和交流都是开放的,没有人规定和限定该说什么和不该

说什么,网络围观者使用狎昵自由的语言进行表达和交流,这种网络语言使人摆脱了身份和地位,没有假装严肃和一本正经。一些网友把低俗当幽默,把恶俗当高雅,把媚俗当个性,以恶搞和反叛为荣,使网络下限屡被突破。这种以吸引眼球为目的、以插科打诨的姿态进行表达的网络话语形式,归根结底是一种颠覆式的、滑稽以及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自我表达,而当其涉及历史、民族文化等相关题材时,就容易造成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卷土重来”的网络文化冲击,不得不加以警惕。

2 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

一般来说,网络谣言的传播是产生、酝酿、发展、顶峰和消退的复杂过程,网络谣言最初总是在一定信息因素的输入下,由网站、论坛、群组上的网络受众对某一特定议题所表达的意见开始,围绕该议题展开讨论、争论,然后通过链接、转载、转帖等方式,不断深入挖掘出此议题的相关资料并形成反馈互动,巩固特定信息的发展,以引起更多网络受众的关注。因而,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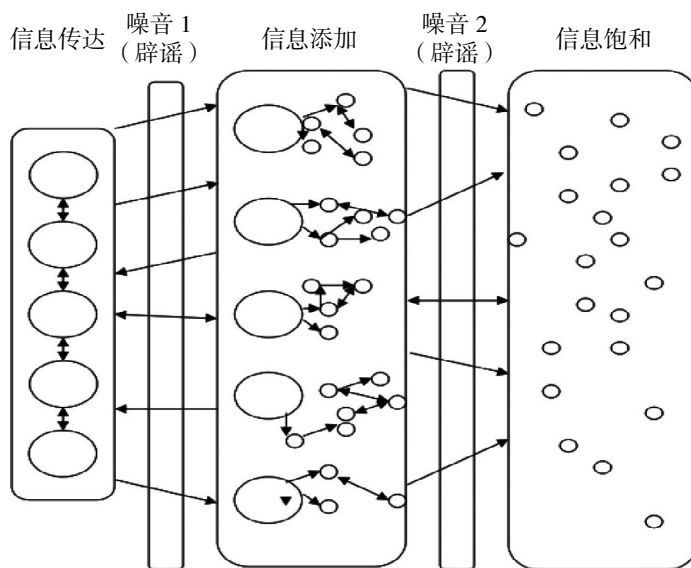


图1 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图

Figure 1 Network rumor propagation mechanism diagram

2.1 网络谣言传播要素

按照沈远新的观点,“谣言的传播实质上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解释和评论的过程”[6]。根据拉斯韦尔的“五W”传播模式理论进行分析,其传播机制的完整建立可主要归结于以下5个环节:

(1) 谣传者。即传播信息的主动发出者。谣传者大多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网络谣言的传播者既是信谣者,也是传谣者,还可能是造谣者。因为除最原初的谣言编造者之外,后续的传播者既然会实施传谣行为,他对此谣言也就不抱有怀疑的态度。

(2) 谣言。即网络谣言传播的主体,是传播者和受传者间互动的介质。谣言凭借语言的表达形式在“谣传者”与“谣传受众”完成传递过程,从而达到让不实信息被广泛接纳的目的。

(3) 新媒体。即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媒介,是谣言传播的载体,也是联结谣言传播各要素的纽带。网络谣言最常借助的新媒体是微信、微博、论坛、电子邮件和移动通讯工具。

(4) 谣传效果。网络谣言的传播不仅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而且对中观群体、宏观社会也有影响。随着网络谣言的不断扩散,网络谣言的传播效果渐渐脱离造谣者的本义,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再是单个造谣者、传谣者所能够控制。

(5) 谣传障碍,指信息在传递、交换过程中,由于信息意图受到误解或干扰而导致的信息失真。谣言的传播非常敏感,易受到来自谣传者、谣言信息、传播通道、社会背景、谣传情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辟谣也可以理解为引入谣传障碍的过程。

2.2 网络谣言传播的信息演变

关于谣言传播的信息演变机制,早期研究者曾设计并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以一张日常生活内容的照片为描述样本,让实验参与者从前到后排列成10人为一列的组队,实验过程中只有排在最前方的第1个人能够亲眼看到照片,后面的每一位实验参与者都只能通过前一位实验参与者“口述内容”的方式获得照片上所描述的信息。最终,试验结果是惊人的:照片上所展示的真实内容

与最后一位实验参与者所叙述的内容之间差别巨大！据此，传播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归纳出了信息传递的三种演变形式：删减、强调和同化。结合上文传播要素内容，大多数网络谣言的成型过程是这样的：最开始时，网络谣言就像一块口香糖，让人去细细咀嚼和品位。在这过程中，为了让“品味”经受时间的考验而历久弥新，听谣者常常会有所“创造”：即从自我的角度去理解网络谣言，并删除含糊、怀疑的信息，在自我经验下丰富充实内容，并为证实谣言寻找、提供证据。然后传播者会因“私弊”而刻意突出信息中的某些部分，当传到第N个人的时候，原本的“谣言”凭借着语言自身所固有的置信特质，已经将传谣者“同化”成了默认所传递信息是正确的，并因而在以此为节点的下一步传播过程中，继续得到进一步的“演绎”与传播。到最后，谣言被异化成了一个全新的、有自我表达观点的全新信息形式，继续得到广泛传播。

3 网络谣言传播的原因

网络谣言的传播是宏观社会背景、中观群体互动和微观个体心理交互作用的结果。

3.1 宏观社会背景

第一，转型期的风险焦虑。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产业发展迅速，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工业革命300年的进程。但我国幅员辽阔，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民众面对的不仅是城乡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和社会矛盾的日渐显现，还有由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等改变而带来的心理冲击。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里，不确定性和由不确定所产生的内心失衡及焦虑是一种常态。个体迫切希望能够消除这种焦虑，维持内心的平衡。

第二，封闭社会的经验主义思维。洛克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并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7]。个体遭遇到令人不知所措的事实时，首先是依据自身的经验作出判断。而且，封建社会的系列历史告诉我们：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培养出经验主义的追随者，政治权力的极度神秘衍生出对小道消息的过分钟爱。封闭社会下信息不足的个体，面对不确定的社会新情境，

最先青睐的是印象中的经验思维。这样的记忆思维在当今社会的最明显体现是民众与舆论权威的信任断裂：大众在面对信息来源时倾向于形成反向认知定势，也就是说未经官方辟谣的事，即使具有很明显的虚假成分存在，大众也不会妄下定论，而经过官方确证参与过辟谣的事项，则具有很大的真实性。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和谐，官方宣传部门在很多时候不得不针对一些谣传进行辟谣；而相当一部分时候这种辟谣因表述不当或不充分，或仅仅是被受众断章取义与过分解读，往往又使其成为了谣言的二次传播起点。这种社会偏见或刻板印象可以说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无形帮手 [8]。

第三，市场膨胀下的“不守门”行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家库尔特·卢因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守门人”或“清道夫”。他们扮演着对网络信息传播进行选择、把关和对垃圾信息进行选择、清理的角色。而在新媒体时代，很明显，传媒组织成为实际中的“守门人”，掌握了对信息传播的第一生杀大权，决定了哪些内容最后可能与受众见面 [9]。现代市场的竞争使很多传媒组织不顾事实，针对人们的兴趣编纂捏造新闻。这种为了追求首发而放弃新闻真实性的“不守门”行为，无意的助长了网络谣言的传播行为。

第四，新媒体技术的推波助澜。同所有媒介手段一样，新媒体也是网络谣言传播的物质载体。同时，新媒体强大的实时发布功能，使其摆脱信息生成流程的局限，跳出了传统“把关人”的包围圈，真正实现了信息的全民共享；而点对点的直达式传播，使得信息的传递毫发无损，达到完美的准确与完整。由此，把关人的把关难度增加、把关权力分化，新媒体技术的迅速运用成了网络谣言快速传播的推手。

3.2 中观群体互动

从个体传播谣言的态度来看，有主动与被动之分。而在主动传播者之中，又可以分为知道此信息为谣言（可称为别有用心型）和不知道此信息为谣言（可称为不明就里型）两种。由此，我们可以将网络谣言的传播者分为三类：别有用心型、不明就里型和被动型。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隶属于种类繁多的群体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到群体因

素的影响。别有用心的传播者,传播的动机首要来源于微观的个体心理,然而单个的动机转变为集体行为还需要关键一步,那就是借助群体互动产生群体共鸣。不明就里的传播者,其本身对此受传信息并无明确认识,对谣言的态度不置可否。然而,本身无态度的人却是最容易产生态度转变的。一旦他人的行为作出了示范,产生了规模效应,就形成了“大家都相信了,我也跟着相信吧”的从众行为。被动型的传播者,不管知不知道其为谣言,心理态度上是不情愿的。但是在一定的情境下,基于群体和人际的传播方式,人与人的距离缩短了,基于信息的交流机制掺杂了情绪、情感的传播,在群体暗示、群体模仿、群体感染等群体性压力机制的作用下,再理性客观的人物,虽然内心不以为然,但表面行为上却再不敢公然表示质疑。

3.3 微观个体心理

个体心理是造谣传谣的原初动力。在此层面,美国心理学教授尼古拉斯·迪方佐(Nicholas Difonzo)总结的传播谣言三大动机,即发掘事实、发展人际交往和提升自我,比较具有说服力。

第一,发掘事实的动机,表现为求知、怀疑、焦虑的连续过程。求知是人的一种本能。相对于公共权威,个体的信息获取极度缺乏。面对不确定的外来信息诉求,尤其是事关重大且涉及自身利益之时,个体容易处于茫然、不安的焦虑状态。一旦公共权威对此应对不力、缺少作为,体制化的信息渠道不能满足需求,谣言就可能成为个体寻求真相的另类途径。

第二,发展人际交往的动机,表现为人们通过分享有价值的谣言信息,可以积累一定的声望,满足交往需求。我们经常收到来自朋友的善意提醒:“请把这条消息转给你认识的所有人。”在普通人无法迅速获得可靠信息来源从而进行正确性比对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会带着一种“好人心态”继续转发给亲朋好友,以期万一有极小的几率能够真正帮助他们获得“生活利益”或避免“日常不幸”,而这种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造成的保守哲学在当代社会则为造谣推波助澜[10]。正如周裕琮所总结的:传播“错误”谣言不受惩罚,而传播“正确”谣言则惠而不费,谣言已经成为朋友之间联络感情的纽带,成为拓宽人际

交往的网络法宝 [3]。

第三,提升自我的动机,发源于个体的自我保护需求。保护自我的方式大致是两种。一是维护自我的相关利益,涩谷保(Shibutani)就曾经说过:与广大民众利益攸关的事件发生时,人们急切需要大量的信息,这时即使连最有效的传播媒介都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另一方式则是通过贬损对方,“他降己升”,也能达到一个相对的提升。借助谣言提升自我的行为应归属于第二类。

4 网络谣言的止息与消解策略

对影响广泛的网络谣言传播,虽不必也不能全盘监管,但决不可完全坐视不管。具体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领域,必须本着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的态度,加强高校网络空间治理,加强校园网络内容建设,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校园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精神世界,通过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正确管理与正向引导,力争做到让网络环境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努力为广大网民特别是新时代的大学生们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4.1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应推崇主流话语的引导

信息的可靠性往往比其本身重要,权威可靠的信息发布源在信息传播中的影响几乎是垄断性的。从战略学上来看,“攻击是最好的防守”,面对愈演愈烈的信息泛滥,与其让网络谣言自由流转,不如主动出击,建立强大可靠的信息发布源,在整个信息传播系统中起主导作用 [11],从而真实全面地传播信息,增加确定性而减少传谣行为。具体在高校思政教育领域进行分析,就可能性来说,相较于自媒体而言,高校所具备的主流、官方传播媒介及传播平台在资源、经验以及传播方式上,仍具有压倒性优势。但如前文所述,如今出现官方辟谣越“抹”越黑,辟谣权威急剧下降的情况。因此,提升主流话语建立的关键在于提升日益降低的公信力。对此,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在进行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应做到:第一,发现谣言,要第一时间发布危机信息,尽快对外宣布危机的真相和处理措施。第二,日常新闻信息要联系实际,克服单纯的文

本说教。以事实或数据真相说话；在回应公众关心的热点难点消息时，做到及时、准确、客观。第三，倾听公众意见，把握公众的抱怨情绪。若谣言涉及面有限，可不直接回击，但要及时进行正面报道，释疑解惑。第四，若谣言涉及面广泛，可通过第三方背书方式，邀请公正、权威的机构或人士发表意见，以提高传播的公信力；或者加以正式声明，以正视听，影响社会舆论。

4.2 高校舆论管理应改堵为疏，因势利导

网络谣言传播的关节点在于每一个信息接受个体的认知、需要和动机。对流传甚广的网络谣言进行分析发现：不少谣言明显逻辑混乱、论证不足，但却被众多网民无异议的接收和传播，其中甚至包括一部分大学生在内。因此，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高校应对相关网络谣言及舆论危机的应急机制、处理机制及反馈机制及，加强与各种社会管理机制之间的衔接，以高校作为辐射基点，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舆论管控与引导体系；在建设高校舆论管理系统的同时，帮助完善社会其他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净化社会网络环境，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改善公共服务质量 [12]。另一方面，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当中应当大力建设宏观高校文化，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文明上网素质：培育理性，摆脱亦步亦趋、盲目听信心态；提升鉴别力，消除大学生群体因心智发展尚不成熟、易将偏激作为武器的片面理解；同时应当尊奉伦理道德，帮助大学生认识到毫无依据的传谣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具体来讲，高校在遭遇网络谣言公共危机时，要坚持“四讲”方略：（1）尽早讲，在遭遇有可能引爆舆论的危机事件时，第一时间主动公布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真实情况，从源头杜绝被不实谣言“先入为主”占领舆论高地的可能性；（2）持续讲，根据事件进展不断发出官方渠道的持续追踪报道，让受众的最大关注度尽可能保持在可靠信息源上；（3）准确讲，尽可能发布对于热点事件真实全面的信息，以客观数据进行对客观事实的详尽报道，避免因信息的报道不到位、描述不准确而给进一步造谣可乘之机；（4）反复讲，针对热点爆点难点问题，应正面回应各方提出的质疑以及疑惑，以官方态度发出官方声音，以权

威解惑杜绝传谣可能性。

4.3 高校应主动营造正向传播氛围

理论上说,在互联网上,发布准确信息和传播谣言的难易程度是一致的。但为什么谣言传播范围及造成影响更为广泛?原因之一是谣言的负面信息吸引更多注意力,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受众,促成了更多的参与。而准确信息则因其确定性,所及受众相对固定不变,参与水平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范围。

因此,在思政工作的实践当中,高校应对网络谣言危机应遵循以下信息发布原则:(1)第一时间发布,谁处置谁发布;(2)快报事实,慎报原因;(3)态度诚恳,不瞒不绕;(4)只讲事实,不讲观点;(5)正面引导,自说自话;(6)重视网评,防止炒作。其次是高校应营造辟谣氛围,即重视中观群体互动情境的影响[13]。压制谣言的一个有效方法是通过高校官方媒体举事实、摆数据去证明那些相信或参与传播的人实际上并不相信这些谣言,因为普通大学生在社会阅历尚浅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14]。如果试图改变大学生对网谣的态度,最好的方法不是批评其错误的离谱观念或强行灌输正确的主流思想,而是运用“同僚压力”既向其展示那些立场相近的人的观点。因此,第一,要通过“议程设置”转移注意焦点、控制讨论方向。第二,要通过群体的交流营造传播氛围、确立传播标杆。第三,要通过周遭的互动化解传播压力。

4.4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应正确整合信息资源

在当今信息社会,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主导权。网络谣言的根源是信息的不对称性,随着信息的不断共享、整合,渐渐浮出水面的真相会逐步代替原先的不实,网络谣言也就就此消解。当代大学生在接受高校教育的过程中,固然由于暂时未能进入社会,其能力、资源相对有限,信息相对缺乏[15]。但是我们的社会是多元的,各大媒体平台掌握着形形色色的海量信息,如果高校能够在思政教育工作过程中将这些信息资源进行合并、筛选、整合,不仅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而且能够凭借官方媒体的正向引导,使网络谣言在传播过程中遇到“辟谣”阻碍,进而从多方面降低其负面影

响效果。

当然,高校整合信息资源、帮助防控网络谣言传播的前提是健全相应的高校应急信息传递机制。因此,应加快各职能部门、各院系内部的网络谣言应急平台建设,提高应急处置效率和水平;整合各专业信息系统资源,形成统一、高效的应急决策指挥网络,实现“统一接报,分类分级处置”[16];同时应做好及时的官方信息发布工作,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的应急处置原则,利用各种方式动员和组织在校大学生不信谣、不传谣,同时建立健全大学生纵向、横向沟通机制及意见反馈机制[17],依法保障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4.5 高校舆论环境应公开透明,及时辟谣

治理网络谣言,高校应全力打造公开透明的舆论大环境,并全过程全方位监督管理,做到及时辟谣。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曾提出“三T”理论,即:Tell your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和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高校网络舆情相关机构应快速反应,主动沟通,面对网络谣言切勿保持沉默;要遵循时间、地点、事件类型、事件简况、目前采取措施的“五要素”信息发布方式;要遵循谣言的时效性规律,尽量在事件发生后4小时内发布辟谣信息。不仅如此,治理网络谣言同样需要社会事实提供现身说法。以2018年8月流出的“天然气涨价”谣言为例,该谣言广泛传播之时,官方虽有辟谣“不涨价”,但是谣言风头一过,部分地区的天然气却真的涨价了!虽然涨价另有原因,但这种实质做法与官方辟谣“表里不一”的社会现实,会对此后官方的辟谣公信力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因此,针对涉及社会生活的网络谣言,需要有具备市场监管能力的相应社会机构来协助保持相应社会现象的“言行统一”[18],最大限度地珍惜与维护官方辟谣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综上所述,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氛围不仅需要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积极引导与全面监管,同时也需要良善的社会服务作支撑。当前最缺乏、也最急需的是对网络信息的识别筛选机制——如在此次防疫期间,因网络信息而接二连三引发的民众过度囤积口罩、抢“双黄连”口服液以及超市抢

米、抢盐闹剧。对此,高校应协助社会各级网络管理机构研发对生活必需品谣传的信息来源敏感反应及相关信息的自动筛选过滤机制[19],建立相应的常态化网络净化管理体系。其次是应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建立健全网络谣言信息的备案。网络谣言的传播尽管适时多变,但是传播的内容具有共通性,即所涉内容多为关乎大多数在校学生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件,或是涉及“丑闻”“内幕”“腐败”“死亡”等负性词语的敏感领域。对这类带有周期性的网络谣言,高校网络舆情相关部门应该提供全面的信息查询与备案服务[20],提高在高校网络环境内针对在校大学生群体的不良信息免疫能力,为网络谣言的治理及高校舆论方向的正确引导提供事实依据与经验支持。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2019年重点项目“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与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ASH0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6-04-26].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6-04/26/c_135312437.htm
- [2] 陈新汉. 社会谣言的社会评价论思考[J]. 求索, 1996(2).
- [3] 周裕琼. 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4] 徐建军.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184.
- [5] 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6] 沈远新. 政治谣言: 界定、生存机制及其控制[J]. 探索, 2000(1): 74-77.
- [7] 洛克. 人类理解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68.
- [8] 王国华, 汪娟, 方付建. 基于案例分析的网络谣言事件政府应对研究[J]. 情报杂志, 2011(10).
- [9] 张雷. 论网络政治谣言及其社会控制[J]. 政治学研究, 2007(2):

56-57.

- [10] 郭小安, 王国华. 谣言定性与定量的再思考 [J]. 情报杂志, 2012 (10).
- [11] 韩影. 新媒体视域下加强高校学生网络意识形态教育的效能和路径分析 [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 (上旬刊), 2020 (5).
- [12] 季海菊. 论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机遇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 (3).
- [13] 郑元景.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探析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1 (6).
- [14] 曾润喜, 王国华, 徐晓林. 高校网络舆情的控制与引导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9 (11).
- [15] 王庚.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研究 [J]. 思想教育研究, 2014 (8).
- [16] 汤力峰, 王学川. 自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 (2).
- [17] 张瑜, 焦义菊. 高校网络舆论的传播特点、影响机制及其引导策略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6 (4).
- [18] 李德福. 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困难及对策研究 [J]. 思想教育研究, 2014 (1).
- [19] 陈少平. 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的研究及处置对策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 (2).
- [20] 崔海英. 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维度与实现方式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5 (3).